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晋石刻大全

●长治市沁源县卷

主编 杜天云



三晋石刻大全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石刻大全. 长治市沁源县卷 / 刘泽民, 李玉明
主编; 杜天云分册主编.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457-0537-9

I. 三… II. ①刘… ②李… ③杜… III. ①石刻 -
沁源县 - 图录 IV. ①K87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2354 号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沁源县卷

总 主 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本卷主编: 杜天云

责任编辑: 落馥香

助理编辑: 薛勇强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晋城市景潮办公用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8

印 张: 58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537-9

定 价: 3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 问：薛延忠 金道铭 申维辰 申联彬 李小鹏 高建民
胡苏平 张 平 李立功 胡富国 白清才 郭裕怀
杨安和 李学勤 姚奠中 张正明 令政策 李潭生
刘 江 张 颌

主 任：刘泽民
常 务 主 任：李玉明

副 主 任：罗广德 李茂盛 张国祥 刘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
柴泽俊 刘纬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赵望进 杨子荣
储仲君 郭双威 梁俊明 赵华山 翁小绵 张玉洁
崔正森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敏政 石金鸣 史耀清 刘光彦 齐荣晋 张鸿仁
吴广隆 李 尧 李 非 李小强 陈长禄 高 可
崔正森 董占锁 董瑞山 潘孝忠 霍润德

总 主 编：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李玉明

副 主 编：罗广德 李茂盛 杨子荣 张继红 落馥香

审 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编纂指导组

顾 问：田喜荣 张 保

组 长：王玉圣

副 组 长：史耀清

成 员：王占禹 张培民 欧蜀渝 牛玉山
弓德旺 马书岐 鹿 敏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沁源县卷》编纂委员会

顾 问：李丁夫 杨红旗

主 任：杜天云

副 主 任：王青盛 王建和 郭庆中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国威 王小红 王东刚 王庆刚 刘金虎 刘保林
阴永明 关保林 宋劲松 何相虎 李 飞 李卫东
李文明 李建功 李建萍 张永东 张成仁 张迎峰
张云江 贺栓跃 郭庆中 翟长宝

办公室主任：关保林 主 编：杜天云
副 主 编：王青盛 执行编辑：关保林
编 校：韩建莉 摄 影：梅全红 药玉华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新中国成立前后凡在《三晋石刻总目》中存目并补充遗漏和新发现的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布施碑，根据历史、文化价值并有助于当地古代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原则，慎重选择收录。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各一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和墓志铭，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分两部分，即现存石刻与佚失石刻。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篇内容一般包括石刻名称(全称)、简介、石刻录文(全文)。元代(含元代)以上的石刻每通(件)配黑白照片或拓片若干张(全景和特写)，明清以后石刻遴选重要者配拓片和照片。

七、凡涉及人物的石刻，在“简介”中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

八、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九、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十、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一、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

(627)。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

十二、表示体积、面积等尺寸的,用厘米。如长(或高)120、宽60、高80厘米,长、宽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又如高120、宽60厘米,高也不加“厘米”。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以便保存史料的真实性。其余均使用规范汉字。

十四、每卷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等,保持原貌,一般不作甄别。

十五、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括注“下阙”。

十六、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检索,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序

李玉明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是立于墓前用于棺木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轘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头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久,常常以龟(实际称鼋)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毁》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峰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宠、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庾狄回洛、娄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

的原因(如信息不畅),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各类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石刻最多时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团体,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只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撷,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拾遗补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具有不能再生性的特点,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佛,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山西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一

史耀清

长治历史悠久,史称上党,又称潞州,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现辖二区、一市、十个县。长治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保存了许多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各个历史时期遗存的碑碣石刻就达数千通(处)之多,历来为人称道。清代学者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絳、泽、潞四属。”

历代碑碣石刻,集记史、纪事、文字、文学、测图、绘画、纹饰、书法、选石、摹勒、镌刻、雕凿等于一体,不仅是我国传统的一种文化形式,还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珍贵文化遗产。尤其石刻文字具有地方性与民间性的鲜明特色,直接或间接地记述了当地的人文地理、重大事件、民俗民风、自然灾害等等,可以说是一种公开的历史档案,对于研究一方地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民俗、艺术、科技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长治市十分重视石刻文字的收集整理。上世纪末,按照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统一部署,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曾组织各县、市、区理事,对于全市范围内留存的历代碑碣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造册,登记收录了上自北魏、下至民国各个朝代的碑碣 1800 余通,搜集碑文数百篇,编辑出版了 20 多万字的《三晋石刻总目·长治市卷》。这部《总目》,对于长治市编撰《三晋石刻大全》长治部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览这些碑刻,遍布全市 13 个县(市、区)境内。从形制上可分为摩崖石刻、铭文画像、人文景观、建筑构件、帖刻原石、经文石鼓、石制器物、界桩界碑、砖陶铭刻、墓志铭、经幢 11 类。从内容上分,有历代各类建筑及自然或人文景观处所镌刻的纪事、施缘、题匾、题名、题联、题景、记游、诗文、记时等碑碣;有皇帝及官府、官员等的敕文、牒文、法令、训令、座右铭、手书、诗文、法书等碑碣;有历代名人神道碑、功德碑、墓表、行状墓志等碑碣;有宗教经文碑;有中医药方碑;有平面镌刻图画碑;有各种乡规民约、契约碑;有天灾人祸纪事碑;有公共事业纪事碑;有名人手书、诗文及书法绘画碑;有分界碑;有革命烈士及事件纪念碑。从年代上分,纪年最早的为沁县南涅水村出土的《永平二年胡保兴造像铭文碑》,时代为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十一月。其余纪年时代依次为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石刻形制之多样,内容之丰富,年代之久远,分布之广泛,可谓名闻三晋,声动九州。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长治市的历代石刻多有佳品,其文化品位、书法艺术、刻工技巧、造型设计等浑然一体,别具一格,匠心独创,巧夺天工,对于推动当地文化研究、文化发展、文化繁荣以及艺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弘扬三晋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笔拾遗补缺的宝贵财富。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到 90 年代,在沁县南涅水村先后出土北朝至宋代石刻造像约 1126 件,被专家誉为中国古代民间石刻艺术珍品,称之为“北魏石刻群”,在全国雕刻艺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山西省政府把此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省、市拨专款修建南涅水石刻馆予以保护,成为当地近年来游客观光的首选景点。另有长治县东呈村的《赠代郡太守程哲碑》,勒石铭文洋洋 1400 余字,记述了这位籍贯长子的官员的家世、生平、品行、事迹、官职等。此碑立于公元 534 年的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碑额题“大魏天平元年岁次甲寅朔三日壬午造讫”。可见长治民风淳朴,自古尚贤,敬重好官,勒石纪念,并为当今写史修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而且,文字书法上承东汉劲直派分书之余绪,又融以汉魏砖文书风,是北朝直笔隶意真书流派中的典型代表,侯镜昶先生著《书学论集》收录此碑,评价颇高。再如唐代碑刻不但数量多,品种全,而且行文、布局、雕艺均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长子县《白鹤观碑》、《大唐郑惠王石记》,长治市《未刻完唐碑》、《李抱真德政碑》、《王深墓志铭》、《朱府君墓志铭》,平顺《明惠大师铭记》,襄垣《大周连简墓志》,黎城《唐故处士王君之碣》等碑碣,形制各异,正、行、草、隶、篆等书体俱备,书法刻工精致完美,行文记事简洁流

畅,堪为其中精妙弘美之代表作,历代金石著作中多有著录和赞美。《大周连简墓志》字兼行、楷、草、篆四体,又有武则天自身造字等,被列为国家二级文物。《唐故处士王君之碣》是长治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通隶书碑碣,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出土于黎城县西10余公里东西柏峪村附近,新中国成立后移置县文博馆藏,后又转藏于省博物馆。此碣形制特殊,为八棱八面幢柱形,有座有顶,标题与落款为篆书,正文为隶书。碣文记述王庆的籍贯、出身、生平始末等,为正史所不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山西巡抚胡聘之将其著录于《山右石刻丛编》,并题跋赞:“碑文字皆渊茂古劲,得汉人家法,字波磔流利,神似曹全碑,在唐碑中足称神品。以出土较晚,字画极完整,仅泐一字,洵可宝也。”再如沁县宋元丰三年(1080)《威胜军新关侯庙记》,平顺东河村《重修圣母之庙》碑,为近年来山西发现的三通宋代有关修建戏楼、舞台碑刻中的两通,记载了早期我国中原地区农村舞台修建情况,反映了我国乐舞与戏曲的独立与成熟,对于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等著作,多次选登了此二碑的拓片和文字。再如长治县元延祐元年(1314)《神农庙碑记》,长治市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前上党县达鲁花赤忽都帖木儿德政记》,平顺县明嘉靖七年(1528)《虹梯关铭》,长子县明嘉靖十年(1531)《宣圣遗像碑》,武乡县南神山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地震碑》,长治市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千手观音画像碑》,沁县清代《康熙诗刻》、康熙五十年(1711)《吴璥御祭碑》、乾隆七年(1742)《致远堂法书陶渊明拟古杂诗手迹帖刻》原石,长子县乾隆五十五年(1790)本地名士冯士翘集韩愈字《纯阳祠诗文书法碑》,潞城市民国年间(1912—1949)《葛井岭禁伐树木碑》等,堪称元、明、清、民国碑刻的代表作,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极高的艺术品位。尤可称道的是,明、清两代初期,由于统治者的轻文及文字狱盛行,碑刻存者较少,而长治地远山高,碑碣遗存却相对较为丰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先辈们也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址和文物,其中碑刻也不在少数,最具代表性的有沁源《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太行太岳烈士陵园的《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决议碑》、《武士敏烈士碑》等,是今天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史料。

石刻虽然坚硬,也有风化殆尽的时候,加之历史上长治一带是兵家必争之地,又发生过多难于抵御的自然灾害,长治的碑刻在新中国成立前损失不少。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在组织编撰《总目》的基础上,又发起了编撰《三晋石刻大全》,这是一次对历史文化的抢救,更是一件泽被后人的大好事。《大全》以县域为单位,每县一卷,编选时间下限截至每卷定稿,这在编选范围和时间跨度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我们翔实调查登记和精心编撰,对于今人和后人了解把握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轨迹,都具有功德无量的重要意义。

中共长治市委、长治市人民政府,长治市各县(市、区)的领导,对于编撰《三晋石刻大全》十分重视,大力支持,为保证这项工作的预期进度和圆满完成创造了良好环境。各县(市、区)三晋文化研究会勇于担当,不辱使命,科学运作,尽职尽责,为做细做好做精这项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相信,《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各县(市、区)分卷的出版发行,将为全市、全省留下一笔宝贵的石头文化资源,为文化强市、文化强省的建设填充一项重要内容,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科学发展起到张风扬帆的给力作用。

序 二

中共沁源县委书记 李丁夫

沁源县人民政府县长 杨红旗

根据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统一部署,我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编纂《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沁源县卷》的工作于2010年7月全面启动。《三晋石刻大全》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学术和实用价值的大型文化典籍。编纂出版这样一部鸿篇巨著,带有抢救和存史的双重性质;编纂出版这样一部石刻史料大全,对于传承发扬山西的文化精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综合国力,必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件继往开来、泽被后世的文化盛事。我们热切期盼《三晋石刻大全》早日全面问世,并愿为此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在我们任职沁源期间,欣逢《三晋石刻大全》的整理编纂,有幸将任职所在地的石刻资料发掘整理、编纂成书并汇入全省的浩瀚典籍,实为人生的一大幸事!

沁源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生态环境、温和湿润的气候、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催生了早期人类活动的发生;尤其是鲜有大旱大涝,“宜耕作、适采集、便狩猎”,易于早期人类“构木为巢,择穴而居”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有利于孕育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这里的早期人类活动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现在馆藏的打击石器标本即是证明,及至新石器时代以至商周时期,亦有许多磨制石器及墓葬古陶被陆续发现;约2300年前春秋时期晋国名士介之推的古墓遗址至今尚存;最早的石刻可追溯到东晋太宁年间(323—325);以圣寿寺、菩提寺、文昌楼为代表的明清古建筑是沁源深厚文化积淀的一个缩影。几千年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大量的官方与民间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孝贤、丧葬等方面的事件和故事相继在这里发生和上演,从而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以石刻的形式记录事情、表情达意,久之便形成了一种独具生命力的石刻文化,为后世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实物资料。沁源历代石刻,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自然及人为损毁等原因,现存的清代以前(含清)碑刻120余通(方),保存较为集中的地方主要有灵空山圣寿寺和菩提寺两处。其中相对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碑刻有:南北朝时期的9通造像碑,大明弘治六年(1493)的《重建青果寒泉禅寺记》,大明弘治七年(1494)的《重修先师菩萨普昭庵碑记》,大明正德九年(1514)的《重修沁源县灵空山圣寿寺古碑铭记》,大明万历三年(1575)的《重修灵空山圣寿寺碑记》,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佛菩萨碑记》,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介之推墓碑》,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天神山圣母庙碑记》,嘉庆十六年(1811)的《重修灵空山神庙记》,嘉庆十九年(1814)的《明建文帝苌臣宋讷碑》。

沁源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为太岳行署和太岳军区所在地,薄一波、陈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长期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著名的“沁源围困战”威震华夏,曾被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誉之为“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现有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地19处,已被各级政府辟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岳北烈士陵园内镌刻着23通由薄一波、安子文、郭钦安、刘开基、顾大川等老一辈革命家题写的碑刻;被誉为“小延安”的闫寨,矗立着“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纪念碑;李元乡马森村立有“围困日寇指挥部旧址”纪念碑;曾以抗日业绩闻名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模范村”——交口乡官军村,以英烈名字命名的沁河镇学孟村、交口乡正中村均有烈士纪念亭、碑建修;尤其是位于菩提山麓的“沁源围困战”纪念馆,更是吸引着愈来愈多的人们前去凭吊和参观。这些珍贵的革命遗迹和革命文物,是如今的老区沁源人民继往开来,锐意创新,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和巨大的精神资源。

现已登记入册并收录的306通(方)石刻(现存241,佚失65),是沁源近2300年社会人文历史的真实记录,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我们一定要以这次编纂《三晋石刻大全》为契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审慎对待并珍视传统文化,认真保护这些石刻资料并深入研究和不断开发利用。

在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在沁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同志们精心谋划,科学组织,深入全县城乡山村,栉风沐雨,跋山涉水,不辞辛劳,查资料、问长者,多方搜索、拓印、整理并编辑石刻资料,历时一年,终于按时完成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沁源县卷》的编纂任务,为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化工程做出了我们应有的积极贡献。

是为序。

概述

沁源县位于山西省中南部,长治市西北,地处太岳山东麓,因黄河支流沁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县境四周环山,西北高东南低,南北长74公里,东西宽45公里,总面积255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7万余亩。年平均气温8.6℃,无霜期在110~180天之间,年平均降水量656.7毫米,年平均日照2519.7小时。

地理坐标为东经111° 58′ 03″ ~112° 32′ 30″,北纬36° 20′ 20″ ~37° 00′ 42″。东与沁县相连,西与古县、霍县、灵石毗邻,南与屯留、安泽接壤,北与介休、平遥相接。现辖沁河、郭道、灵空山、王和、李元5镇和王陶、聪子峪、交口、韩洪、法中、中峪、官滩、景凤、赤石桥9乡,259个行政村,人口约16万。

沁源历史悠久。早在远古,先人们即在沁河两岸聚居并从事农牧业生产;沁源在夏商时属冀州,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属韩、赵,秦属上党郡;汉置谷远县,晋废,北魏建义元年(528)改谷远为沁源。境内留有許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在这些遗迹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当数旧石器时期的花坡、王和遗址和新石器时期的河西、南石遗址,另就是春秋时期的介之推古墓以及始建于东晋太宁年间(323—325)的景凤天神庙碑(已佚失);史料价值较高的当数北魏时期的造像碑,遗憾的是残损严重(出土于法中乡柏木村,现已收藏馆中);颇具思想文化价值的当数《百草村创建文昌楼碑记》所倡导弘扬的孝忠精神,《岳北烈士陵园建修碑文》所赞颂推崇的为国为民不惜牺牲的献身品格,《沁源围困战纪念碑文》所记载的抗日军民的英勇和智慧,《创建义学碑记》关于县令朱三锡创建义学、劝民读书的亲民政绩等;文辞优美,令人荡气回肠的佳作当数《柏子村烈士殉难碑序》、《绵上县忠烈碑题记》等;极具书法价值的当数薄一波、陈赓、周义中等领导所题写的“遗芳千秋”、“浩气长存”烈士纪念碑与《〈沁源〉诗碣》碑;数量较多的当数散落在全县各地的寺、庙、观建(重)修及其所属碑刻。这些碑刻记载,为后世遗存下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和精神食粮。

北魏时佛教方传入沁源。太和元年(227)官滩乡琴峪村即有隆兴寺兴建,西魏大统年间(535—551)交口乡官军村即有观音寺兴建,隋开皇年间(581—600)王和村建有龙华寺。进入唐代,本县佛事兴盛,纷纷建寺造像,著名的寺院有圣寿寺、灵寿寺、海泉寺、螺山寺、慈云寺、普通寺等。后晋天福初年在县境内龙居山建麻衣寺,后汉乾祐年间(948—950)在上观山建香村寺,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在绵上建宝觉寺,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3)在景凤建石佛寺。以后元明清各代,相继建寂照寺、雷音寺、兴国寺、青果寺、报国寺、普济寺等27所,佛院3所,庵6所。遗憾的是,这些寺院及所属碑刻大都毁于日军战火,十年“文革”又遭毁损,这些劫难给历史文化的传承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本书收录的现存石刻共241通(方),散存于全县各地。保存较为集中的地方仅有灵空山圣寿寺和菩提寺两处,文物馆现收藏的16通石碑则辗转来自不同的地方。

灵空山圣寿寺,建于唐景福二年(893),宋端拱二年(989)赐额圣寿寺,世传先师菩萨卓锡之地。先师菩萨,大唐十四世皇孙,唐懿宗四子李侃。唐僖宗乾符六年(879),黄巢起义陷长安,李侃避乱出奔,来至冀州谷远九顶山(今灵空山),修真养性,渐成正果。僖宗弟昭宗乾宁元年(894)二月二十五日,先师无疾而化。后唐同光、天成、长兴、应顺、清泰年间(923—936),封为施雨王。至后汉乾祐年间(948—950),封为菩萨。到了周末显德年间(954—960),封为先师菩萨。清顺治间(1644—1661)、康熙三十三年(1694)、嘉庆十二年(1807),历经三次增修。1980年9月,县人民政府组建专门机构,拉开了重新大修圣寿寺的序幕。从1991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一届“灵空山避暑节”,千年古寺重又再现了昔日的鼎盛。此次在灵空山圣寿寺共收录了11通石碑。这11通碑,虽然保存现状参差不齐,但仍为我们研究先师实迹和圣寿寺的沿革提供了至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堪称本书的精华之所在。在这11通石碑中,明代的6通,清代的3

通,民国的1通,新中国成立后1通。保存最早的是刻于明弘治七年(1494)的《重修先师菩萨普昭庵碑记》。此外,寺内还保存了元、明、清各个时代的古建筑,并有泥塑、彩绘、书画、根雕等历史沿革陈列供游人参观。

菩提寺,在县东北20公里菩提山。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建。乾隆五十六年(1791)、同治七年(1868),历经两次重修。经县人民政府批准,2006年11月本县康伟公司开始重新修缮扩建并开发,2007年4月正式对游人开放。本寺所藏的12通石碑,虽然现已全部移至回廊内以免遭雨淋,但却难抵日甚一日的风化之蚀。勒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代相对久远的《佛菩萨碑记》,是迄今可考的关于菩提寺大型重修的最早碑志,但碑面毁损严重,半数以上的文字已无法辨认,勉强辨认出的文字也难以完整成句,唯“康熙三十二年”等字样较为清晰,其余皆斑驳模糊;《重修菩提山庙碑记》、《创建三教圣人、关圣帝君、八祖罗师庙碑记》等两通石碑尚基本完好。

收录在书中的16通馆藏石碑中,有南北朝时期出土的《北齐释加造像碑》、《阎兴和造像碑》、《造像碑》、《五号造像碑》、《张洪贵造像碑》、《比丘尼法彻造像碑》等6通史料价值较高的碑刻,但残损风化较为严重,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另有北宋时期的碑刻1通,剩下的9通即是从馆外移藏于馆中的不同类别的石碑。

除前所述的圣寿寺、菩提寺以及馆藏的39通(方)碑碣外,另有沁河源头的3通,寺庙重(建)修碑记77通。在这77通重(建)修碑碣中,知名度较高的有:《百草村创建文昌楼碑记》,《沁源北乡十六村改修龙华寺碑记》,《螺山寺重修碑记》,《景凤寂照寺重修碑记》,《天神山圣母庙碑记》,《重修老君殿碑记》,《重修关帝庙碑》,《重修石佛寺碑记》等。余下的122通石碑中,有79通碑碣内容较为庞杂:有摩崖石刻,有墓志,有石幢,有诗咏题名及建桥补路兴学等碑碣,其中以北齐武平五年(574)刻勒的《摩崖造像石刻》为最早,其余勒石年月多为民国后或建国前后。最后剩下的43通石碑为革命烈士纪念碑。

沁源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沁源为太岳行署和太岳军区所在地。1942年10月,日军侵占沁源县城,并在二沁(沁源、沁县)大道、沁(源)屯(留)大道和安(泽)沁(源)大道之白狐窑、交口、霍登、闫寨、中峪等地构筑据点,将沁源作为“山岳剿共实验区”,以推行其分割、蚕食抗日根据地的计划。鉴于上述形势,中共太岳区党委、太岳军区于1942年11月18日指示:由中共沁源县委、县政府和太岳军区所辖之三十八团共同组成对敌围困斗争总指挥部。在指挥部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沁源军民采用空室清野、切断日军补给线、主动出击、长期围困、频繁袭扰等战术,终于迫使日军于1945年4月11日逃离沁源,创造了群众性长期围困战的范例。为此,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誉之为“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革命前辈(先烈)在沁源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被辟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基地全县共计有19处,主要包括岳北烈士陵园、革命纪念地和烈士纪念碑。

岳北烈士陵园坐落在县城西南,1949年5月1日至12月15日,由中共岳北地委和中共沁源县委合建。主体建筑中间为烈士亭,东西分别是胜利亭和光荣亭。主建筑之南约50米处有一砖砌斗拱三壁牌坊,主建筑后即为烈士陵墓。园内镌刻着23通由薄一波、安子文、郭钦安、刘开基、杨维华、顾大川等老一辈革命家题写的碑刻。数十名烈士的芳名镌刻在这里,无数先烈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镌刻在这里:沁源县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李素卿的纪念碑在这里矗立;沁源第一支抗日武装的创始人胡奋之的纪念碑在这里矗立;杀敌英雄李学孟等烈士的纪念碑也在这里矗立;公墓北还有洪赵支队32位烈士的碑志……

薄一波、安子文、顾大川的题词分别是:“为抗日战争和为解放战争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死有重于泰山”;“太岳人民永纪忠烈”。薄一波、谢富治、牛佩琮、王新亭、陈赓、裴丽生、王鹤峰、毕占云的共同题词是“遗芳千秋”。主要楹联有:“英风吹动太岳山,热血洒遍沁河源,八年奋斗如一日,留得英名万古传”;“英名尚在沁河汨汨千古悼,血不白留霍岳巍巍壮士怀”;“慷慨流鲜血,一切为人民”等。

自陵园建成以来,前来这里凭吊先烈、寄托哀思的人们经常络绎不绝。1988年,亲身参加过侵华战争,曾在沁源烧杀抢掠的日军省沁代表团成员到此向先烈叩首谢罪表示忏悔。尤其是这23通重要的碑刻,为后世研究沁源的近现代史并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主要革命纪念地有:位于有“小延安”之称的闫寨的“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位于李元乡马森村的“围困日寇指挥部旧址”;位于菩提山麓的“沁源围困战”纪念馆等,均有碑刻记载。

43通烈士纪念碑中,除烈士陵园外,还有闫寨烈士亭,张法中、赵正中、吴清化等烈士纪念碑,《绵上县忠烈碑题记》,《秦家庄村抗日烈士纪念碑碑文》,《新建七村围困二年半死难烈士碑楼记》,《军工一厂死难烈士碑》,《柏子村烈士殉难碑序》等20余通。

从介之推葬于沁源算起,至今已有约2300个春秋。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许多碑碣已湮没或毁损:如金大定十四年(1174)的《太清观记》,元至元五年(1268)的《县尹张公去思碑记》,明弘治十三年(1500)的《沁源县兴造记》,明隆庆四年(1570)的《重修城隍庙记》,清康熙十年(1671)的《创建魁星阁碑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重修文昌楼碑记》等颇具价值的碑志。好在从县志和相关史料中尚可找到这些碑刻的内容,现将搜集到的著录于他处的65篇佚失碑文收入此书,仍可对研究有关历史提供颇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沁源现已登记入册的石刻306通(方),现存石刻241通。按年代划分,南北朝11,北宋1,金1,明16,清92,中华民国28,中华人民共和国81,纪年不详11;按内容分,名碑(唐以前)9,教育3,诗咏题名28,义行4,记事119,烈士碑43,墓志铭表18,匾额1,乡规民约1,石幢1,楹联3,摩崖石刻5,道观2,其他4;按单位(地域)分,灵空山景区12,烈士陵园17,文物馆16,交口乡33,韩洪乡19,法中乡2,灵空山镇7,郭道19,闫寨烈士亭7,聪子峪7,中峪5,赤石桥6,王陶13,景凤26,王和20,李元6,官滩9,沁河镇17。佚失石刻65通,其中南北朝1,金1,元1,明16,清36,中华民国7,纪年不详3。

综上所述,本书所收录的这些石刻资料,是沁源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称得上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份经抢救得来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必将对沁源地方史研究,对沁源的文化乃至经济建设和发展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沁源县卷》编委会

目 录

凡例	
总序	李玉明
序一	史耀清
序二	李丁夫 杨红旗
概述	编委会

上编 现存石刻

●北朝·宋·金

五号造像碑(北朝)	(五)
邑主王郭仁合邑者邑子六十人等敬造观音石像(北朝)	(六)
比丘尼法彻造像碑(东魏天平三年)	(八)
造像碑(东魏天平三年)	(九)
北齐释加造像碑(北齐天保八年)	(一〇)
张洪贵造像碑(北齐天保九年)	(一一)
大齐天保摩崖石刻(北齐天保年间)	(一二)
阎兴和造像碑(北齐武平二年)	(一三)
摩崖造像石刻(北齐武平五年)	(一四)
天堂主李思□造像碑(北朝)	(一五)
比丘法碑(北朝或隋代)	(一六)
北宋羽姓碑(北宋元祐七年)	(一七)
沁源县良安乡功德幢(金大定二十六年)	(一八)

●明

重修寂照禅寺碑(景泰七年)	(二一)
重修娘娘庙碑记(成化四年)	(二三)
重建青果寒泉禅寺记(弘治六年)	(二五)
重修先师菩萨普昭庵碑记(弘治七年)	(二七)
重建沁源县灵空山圣寿寺古碑铭记(正德九年)	(二九)
螺山寺重修碑记(嘉靖二十五年)	(三一)
重修观音碑记(一)(嘉靖四十一年)	(三三)
《沁源》诗碣(嘉靖四十一年)	(三五)
黄宅杨氏功德碣(隆庆元年)	(三六)
郭道村隆庆元年残碑(隆庆元年)	(三七)
布政司刘良辅功德碑(隆庆四年)	(三八)
修补佛殿碑录(隆庆六年)	(三九)

重修灵空山圣寿寺碑记(万历三年)	(四〇)
重修龙港堂碑(万历十九年)	(四三)
重修朝元观下院云溪庵终记(万历二十五年)	(四五)
重修庙宇立碑记(万历年间)	(四七)

●清

重修前后殿宇圣像碑记(康熙十五年)	(五一)
龙王庙重修碑记(康熙二十九年)	(五三)
佛菩萨碑记(康熙三十二年)	(五五)
重修风神庙碑记(康熙三十二年)	(五七)
王壁村仓官庙碑记(康熙三十五年)	(五九)
南山松林记碑(康熙五十年)	(六〇)
重修石佛寺碑记(雍正五年)	(六一)
创建观音阁碑记(雍正六年)	(六三)
沁州施工修桥碑(雍正十年)	(六四)
西神庙重建碑记(乾隆六年)	(六五)
重修睡佛寺碑(乾隆九年)	(六七)
炼阳观碑记(乾隆十三年)	(六九)
龙王庙碑记(乾隆十三年)	(七一)
介之推墓碑(乾隆二十五年)	(七三)
龙华寺志石序(乾隆三十年)	(七四)
清故先祖药翁墓碑(乾隆三十二年)	(七六)
王家墓碑(乾隆三十四年)	(七七)
天神山圣母庙碑记(乾隆三十四年)	(七八)
重修三教寺碑记(乾隆三十四年)	(七九)
百草村创建文昌楼碑记(乾隆三十八年)	(八一)
重修圣母庙戏台碑记(乾隆三十八年)	(八三)
垦修路途碑记(乾隆四十年)	(八五)
重修碑记(一)(乾隆四十二年)	(八七)
孙家后土神碑(乾隆四十三年)	(八八)
重修五凤峪庙碑记(乾隆四十六年)	(八九)
三教龙王庙重修碑记(乾隆四十六年)	(九〇)
重修圣母庙碑记(乾隆五十三年)	(九二)
重修碑记(二)(乾隆五十四年)	(九四)
任公墓碑记(乾隆五十四年)	(九六)
皇清儒学生员郭翁墓碑(乾隆五十五年)	(九七)
打井碑记(乾隆五十八年)	(九八)
重修天神庙碑(嘉庆元年)	(九九)
清处士孙翁讳显盛君墓碑记(嘉庆三年)	(一〇一)
重修老君殿碑记(嘉庆五年)	(一〇二)
重修龙天庙碑记(嘉庆六年)	(一〇四)
三官庙碑记(嘉庆十年)	(一〇七)
张家祖坟后土碑(嘉庆十二年)	(一〇八)